

一座山的「民心账」

本报记者 田勇 文并摄

当官做什么

行记

善洲林场坐落在云南省保山市大亮山，得名于杨善洲。进入夏季，山里的空气湿润清甜。华山松铺满山坡，树干长得像象腿一般粗，遍布青苔。杨善洲事迹陈列馆里，悬挂着两幅照片：一幅山秃岭荒，

一幅林海莽莽。同一座大亮山，前后不过20多年，却活脱脱换了一副面貌。参观的人走到这里，总要驻足许久。这两幅照片，把一本“民心账”说得明白明白。



22年间，大亮山全部披上了绿装，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7%攀升至97%。这两张今昔对比的照片，生动展现了杨善洲的坚守与贡献。

从善洲林场向北，经过曲曲绕绕的山路，就到了距大亮山最近的雷打树村。村名源自一个传说：早年村口有棵古树，屡遭雷击，树心焦黑却年年发芽。村民说，那棵古树命硬，像极了这里的人。

但命再硬，也扛不过缺水。村党总支书记曹鲲鹏告诉记者，当年村里流行一首民谣：“大亮山，秃光光，有女莫嫁雷打郎。吃水更比吃油贵，洗脚洗脸算着浆。”那时的雷打树村，山光水枯，吃水要人挑马驮，走上十几里路。“乡亲们借水要记人情簿，村民结婚，经常用几挑水去做贺礼。”经历过那段岁月的村民李炳军补充说。

其实大亮山原本是有水的。老辈人讲，早年上山砍柴，沟里泉水叮咚，捧起来就能喝。后来树砍光了，水就跟着跑了，人也跟着遭了罪。从大亮山变成“大秃山”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掐指算来也不过20年。李炳军说，那些年他常哭，因为憋屈——有山有林的地方，怎么就能缺水呢？

转机，从杨善洲退休后来到大亮山种树的那一天开始。

在施甸县档案馆，珍藏着一份杨善洲亲笔书写的入党申请书。馆长赵开月带记者走进面积不大的展览室，指着那份写于1952年的申请书说，文辞质朴，语句简单，但“为人民服务”5个字的承诺力透纸背。“正是信守这份承诺，才让大亮山的荒坡重新泛绿，让雷打树的水管里淌出村民盼望的清泉。”赵开月说。

1988年，61岁的杨善洲退休。大家以为他要开始享清福了，没想到他卷起铺盖，要为大亮山“办件事”。退休当月第三天，他领着调集的十几个人，用雇来的马驮着被褥、砍刀，钻进了大亮山。

大亮山深处藏着一条蜿蜒小道，只有两三步宽，全是石板铺出来的，两侧密密匝匝全是树。1988年杨善洲进山时，领着人披荆斩棘开了这条路，那些年，这是林场往外运物资的唯一通道。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师聂汝玉领着记者边走边说，这条道被大家叫作“善洲小道”。

顺着“善洲小道”往前，穿过一片故事林，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立在眼前。推开厢房门，墙上挂着斗笠、蓑衣、水壶，桌上搁着收音机、手电筒、煤油灯，墙脚立着镰刀和砍刀。这是1992年林场建起的第一间像样的场部，杨善洲却一天都没住，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。而在那之前，他在油毛毡搭的棚子里一住就是9年半。

当年没有路。人们常会看到一位花甲老人，在大亮山一边挑着担，一边赶着马，在山里一走就是大半天。“大亮山海拔高，夏天闷，冬天冷，春秋刮大风。”聂汝玉说，恶劣的自然条件让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，人们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他一阵阵的咳嗽声。

比艰苦的自然条件更难的，是没有钱买树苗。每次回保山或施甸县城，杨善洲就提着口袋在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。回家清理干净，积少成多，再用马驮上山。这条新闻曾轰动保山，非议的声音不止一次传到他耳朵里。但杨善洲不在乎，他说：“捡果核不出成本，省一分是一分。我这么弯弯腰，林场就有苗育了。等果子成熟了，我就光彩了。”

跟着杨善洲一起上山植树的亲历者周波，如今在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继续讲述当年的故事。他告诉记者，杨善洲不光是种树。刚上山时，周边的芭蕉林村、雷打树村路不通，电不通，水不通，杨善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一边种树，一边修路。路通了，山里的粮食蔬菜卖出去了，老百姓看病也方便了。接着通电、通水，水管架到了家家户户。

周波至今记得杨善洲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，雨天它能吸，天旱它能吐。雷打树村村民到处找水，就是因为山上没有树，这叫山穷水尽，所以我们要多种树，有树才能留住水。”

20多年间，大亮山全部披上了绿装，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7%攀升至97%。山绿了，水来了，杨善洲却老了。

2009年4月，82岁的杨善洲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：将5.6万余亩林场、1600多万棵树木的经营权无偿移交给国家。移交手续办完那天，他站在老场部门前，望着满山葱茏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树是国家的，是老百姓的，我只是替大家种了几年。”

今天的善洲林场，经营管护面积已达6.7万余亩。每年秋天，周边村民进山采摘松果，每公斤松子能卖到60多元钱；林下的菌子、野菜、草药也成了百姓的财路。更大的变化在林下——林场与云南农业大学合作，发展了4000多亩中草药基地，黄精、西洋参等作物在林间扎根。林场涉及周边3

个乡镇11个行政村78个村民小组2484户农户。

善洲林场场长姜琨说，林场还创新推出了“721”利益联结机制——企业负责经营占七成净利润，林场与林农以林地经营权入股占两成，村集体以水利设施入股占一成。“老书记的奉献，不是单纯吃苦花力气，而是愿意为周边群众去做事。”姜琨说，“原来条件那么差，他们能做成那样；现在条件好了，我们更得把工作抓好。”

晚年的杨善洲偶尔回大亮山看看，走不动了，就坐在老场部院子里远远望着那片林海。2010年10月10日，83岁的杨善洲去世，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大亮山的雪松下，永远守着他种下的那片绿色。消息传回雷打树村，许多村民哭了。

村干部带着乡亲们去送别，回来的路上，有人指着地里说：“看，今年的萝卜长得真大。”那是雷打树村第一次种出将近一米长、碗口粗的白萝卜。过去山秃水枯，地薄如纸，萝卜长不大，土豆像鸡蛋。如今水土养人了，地也肥了，种什么都旺。萝卜从地里拔出来，洗净了，白生生的，咬一口，脆甜，就像雷打树的日子，从苦到甜，从干到润。

曹鲲鹏站在地头，望着远处大亮山层层叠叠的绿，轻声说：“老书记把林子捐给了国家，更把福气留给了我们。”

萝卜还在长，水还在流，林子还在往远处蔓延。杨善洲走了，可他种下的一切，都在往下扎根，往上生长。这本“民心账”，老百姓记着。



大亮山“三宝”。



地肥了，种什么都旺。

父亲一样的好人

本报记者 田勇

善洲林场的第一代场部，是一间油毛毡搭的老窝棚。窝棚不大，大概三四张乒乓球台大小，跟护林人临时歇脚的地方没两样。杨善洲在这里住了9年半。

窝棚正前方有一棵杉树。一般杉树树干笔直，树冠像撑开的雨伞，但这一棵不一样——主干长了一截后三岔而开，中间枝杈像锤子，两边枝杈呈“U”形。带学员来这里的老师总会停下来问一句：“你们看它像什么？”学员们一看就明白了。这便是善洲林场“党徽树”名字的由来。

窝棚地上铺了几缕龙须草，就算是床。窗前几块石头垒了个火塘，火塘上吊着一把烧得黢黑的水壶。床边挂着一顶竹帽、一件蓑衣、一把砍刀，是杨善洲当年的“三件宝”。

每天清晨，窝棚外都会有人来。他叫周波，是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、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。周波18岁上山，在林场待了30多年，当年是跟着杨善洲的职工里最年轻的一个。这些年来，中央和省市媒体、各地来培训的学员都问他同一个问题：杨善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周波的回答每次都一样：“好人，像父亲一样的好人。”

他记得第一次见杨善洲的样子——挽着裤脚，鞋底带泥，手里提一把砍刀，活像个农民。“大道理我也会讲，但小事更见人心。”周波给记者讲了一段往事：有一回在林场吃饭，蒜苗炒肉端上桌，杨善洲总要扒



杨善洲在油毛毡搭的棚子里一住就是9年半。

出一碗来留着，说“一顿吃了下顿吃什么”。可林场职工朱家兴病重住院，他却借钱送去，又把工资按月送到朱家兴手里。周波负责送钱，看着朱家兴从绝望到康复，他明白了什么叫“心里装着别人”。

“老书记走的时候，林场刚有点样子。”周波站在老窝棚前说，“那时候，树还没这么高，林子还没这么密。”

周波每天到这里，跟老书记说说话。说天南海北的学员奔着他来；说他喜欢的玉兰今年又开花了；说林场的松果去年结得多，老百姓摘去卖，一斤能卖30多块钱；说山下的村子通了自来水，再也不用挑水吃了；说野猪、猴子又回来了，夜里能听见林

子里跑动的声音；说原来那些想走的职工，如今谁也不肯走了。说这些的时候，周波眼睛亮亮的。“老书记当年种树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早晚有一天会是这样。只是他走得早，没看到。”他又说，“不过没关系，我替他看着。每天来看一眼，跟他说一说，他就能知道。”

风穿过松林，沙沙响。“党徽树”的枝杈在风里微微晃动。周波转过身，沿着“善洲小道”往回走，背影在树影里越来越小。

年复一年，花开了，果落了，树长高了。老窝棚还在，“党徽树”还在，周波还在。他们守着一间窝棚，一片林子，也守着一个人留在这里的心血。